

文化透析

巴勒斯坦人自杀性袭击的文化心理探源

王亚宁

摘 要：在巴以冲突中，当中东和平进程遭遇挫折、巴以双方力量严重失衡时，巴勒斯坦人中频发自杀性袭击，本文在分析此现象产生背景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其“烈士”情结的宗教文化心理及其具体表现，进而揭示出此现象的出现，既是巴以双方力量严重失衡所致，又是巴人对巴以冲突的非理智反应。

关键词：巴勒斯坦人；自杀性袭击；“烈士”情结

作者简介：王亚宁，硕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边防系边管教研室副教授（河北廊坊 065000）。

文章编号：1673 - 5161 (2007) 05 - 0075 - 06

中图分类号：G371

文献标识码：A

巴勒斯坦政坛巨变，既是法塔赫与哈马斯利益冲突的结果，又是执政理念矛盾的折射，因为前者主张以和平对话解决巴以冲突问题，而后者主张以武力对抗来解决巴以冲突问题。诚然，巴政坛变化势必会引起巴对以斗争策略与斗争方式的变化，但斗争策略与斗争方式的变化是否意味着完全放弃武力？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系统研究巴勒斯坦自杀性袭击这一现象频发的社会宗教背景及其表现等。

一、“烈士”情结产生的背景

巴以冲突是一个既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简单体现在冲突的实质上，即两个民族对同一块土地的争夺；复杂则体现在引发冲突的原因及各种干扰因素上，历史、传统、宗教、民族、土地以及大国的干预等使得这个简单问题变得极其复杂。因此，虽然巴以双方以及国际社会都做了各种努力，但许多无法改变的因素却使巴以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很明显，以色列而非巴勒斯坦依然掌控巴以冲突的主动权，前者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充足的外援使后者在巴以冲突中始终处于劣势。日益恶化的经济和社会形势、看不到希望的政治解决、伴随着以色列强加给巴勒斯坦普通民众的种种限制，催生了巴勒斯坦人的挫折感、绝望感和对以色列的极度仇恨。^{[1]61} 对于一个身处绝境的弱势群体来讲，生命是淡漠的，以牺牲生命来推动国家的独立成为他们的现实选择。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种种霸道行为激发出巴勒斯坦人的“烈士”情结，这种“烈士”情结的产生来自于巴勒斯坦人民内心深处难以形容的羞辱感。当以色列士兵无法抓到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时，愤怒的以色列士兵便开始拘留、殴打甚至向巴勒斯坦人开枪。^{[2]14} 有时候，以士兵会故意刁难巴人，让他们在检查站无休止地等待，对他们进行搜身检查，或者在半夜将巴人叫醒，让他们去街道上粉刷那些写有不利于以色列标语的墙壁。^{[2]14} 有研究表明：自杀性袭击者有很

多特点，但最为突出的则与其痛苦经历有关，今天的自杀性袭击者就是昔日那些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遭受以色列国防军羞辱的孩子们。^{[1]61}屡遭羞辱的巴勒斯坦人希望挽回自己的面子，赢得自己的尊严。在其他方式都无法奏效的情况下，他们只有通过自杀性爆炸来获取暂时的骄傲和自豪。于是，“烈士”情结在羞辱中产生。

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看，随着周边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外交关系逐步正常化，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心度似有所降低，而联合国又很难彻底、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再加上美国在巴以问题上一味偏袒以色列、以色列采取的所谓“犹太逻辑”使得巴人陷入无助和孤独。偌大世界没有一个可以为巴人“伸张正义”的地方，没有一个为巴勒斯坦问题挺身而出的铁杆盟友。从作为个体的巴勒斯坦人的现实生活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当一个巴勒斯坦男孩和父亲通过以色列检查站时，他看到自己的父亲受到以色列人的侮辱和拒绝后，伤心地想：“我的叔叔已经死了，我的哥哥还在监狱里。”^{[3]84}孤独和无助使巴人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靠自己才会有出路；只有靠自己，巴勒斯坦才会有希望。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实施自杀性袭击成为“烈士”，是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最切实可行的方式。“烈士”情结在巴人无限的孤独和无助中得以强化。

综上所述，绝望感、羞辱感、孤独感和无助感催生了巴勒斯坦人的“烈士”情结。这种看似疯狂或者失去理智的行为表现，真实反应了巴勒斯坦人的现实处境。虽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漠视生命，但对于巴人来说，他们无法理性地面对现实。若要正确解读这一现象，就应像以色列著名作家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在其新书《死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奥斯陆和平协议十年后的以色列》中所说的那样，应该从这些把死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人群内心深处去了解巴以冲突的实质。^[4]

二、“烈士”情结的体现

在巴勒斯坦人看来，所有的自杀性爆炸行动都属于“烈士”行为，都应得到巴社会和民众的支持，社会支持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被描述为“烈士文化”^{[5]828}。连巴勒斯坦官方的术语中都没有“自杀性爆炸”一词，只有“烈士”行为。^{[1]62}可见，巴人的“烈士”情结与巴“烈士文化”紧密相连，“烈士”情结的体现就是对“烈士文化”的一种实践。

(一) 宗教人士对“烈士”行动的倡导使“烈士”情结具有宗教合法性。巴勒斯坦社会宗教氛围浓郁，伊斯兰教影响着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巴普通民众对于伊斯兰教的理解和认识深受宗教人士的影响，后者将“烈士”行为与伊斯兰教又紧密结合，并从伊斯兰教中寻求“烈士”行动的合法解释。如巴宗教人士认为，“烈士”行动就是为了实现真主安拉的意愿，对犹太人和以色列发动圣战是每个巴勒斯坦人的义务等，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将这种解释传递给巴民众。已故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曾经说过：自杀性袭击者应得到宗教人士的祈祷与祝福，因为他们不是出于个人原因的简单自杀，而是一种“烈士”行为。^{[1]9}甚至有些宗教人士在布道时也表明其对自杀性爆炸行动的支持与认可，例如卡达维在布道中说，1996年2月底3月初，发生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等地的自杀性爆炸事件不是恐怖行为，而是为了安拉的圣战。^{[1]9}伊卜拉辛·马迪赫在加沙一座清真寺的布道中也指出：对于这一点（“烈士”行动），《古兰经》已讲得很清楚，伊斯兰国家最大的敌人就是犹太人，安拉会与他们交战……最仇恨我们这些信徒的是犹太人和多神教者，没有什么会阻止我们在他们中间引爆我们自己。^{[6]71}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发言人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每个自杀性爆炸行动的志愿者在执行任务前都要确认自己的行为具有宗教合法性。^{[7]38}巴宗教人士这些布道言辞传递给巴民众的信息是：“烈士”行动是伟大的、正义的、合法的，是安拉所乐于见到

的，也是安拉所希望的。成为“烈士”后，他们就可以升入天堂。

巴宗教人士对自杀性爆炸行动的倡导，使巴民众深信自杀性爆炸行动如同向国家交税一样理所当然。一位 26 岁的巴勒斯坦女性在谈到自己对自杀性爆炸行动的看法时说：就像你向自己的国家交税一样，只不过我的税是我的身体，我将把我的生命献给巴勒斯坦解放事业。^{[5]828} 一面是宗教人士的布道和熏陶，一面是巴勒斯坦艰难而困苦的现实，巴民众自然而然与“烈士”情结紧密相联。在他们看来，自杀性爆炸行为具有宗教合法性，这种宗教合法性扫除了巴人内心深处的障碍，使他们在执行自杀性爆炸行动时理直气壮。

(二) 教育、媒体的积极介入使“烈士”情结呈现出明显的承继性。在巴勒斯坦正规学校教育中，教科书、官方电视、学校的各种仪式乃至写作和诗歌比赛等经常以“烈士”或者自杀性袭击为主题。^{[5]829} 学生们在学校里受到的熏陶均具有浓郁的“烈士”气息，孩子们思考的大多是如何使自己成为“烈士”或者自己的葬礼应该如何进行。如巴勒斯坦某一学校的学生在校园里热衷于讨论自己最后的葬礼，有的学生认为自己的葬礼应该在斋月举行，有的则认为在自己的葬礼上应该有自己喜欢的巧克力等。^{[3]108} 巴勒斯坦的“烈士”教育不仅在中小学教育中很普遍，在高等教育中亦然。于 2001 年 6 月 22 日成为“烈士”的伊斯梅尔·马萨瓦比 (Ismail Masawabi)，就曾在学校的遗书写作比赛中获得过一等奖。有学者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巴勒斯坦的教育思想确实在鼓励孩子变成“烈士”^{[8]96}。巴勒斯坦的“烈士”教育在孩子心灵深处种下了“烈士”的种子，当其他孩子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巴勒斯坦的孩子却在苦苦思索如何才能使自己成为“烈士”。这种“烈士”教育使得“烈士”行动“后继有人”，因而巴人的“烈士”情结伴随着“烈士”教育的不断开展而继承下来。

巴媒体对于“烈士”行为的正面性宣传也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立场方面，巴媒体表扬和支持自杀性爆炸行动，积极播放自杀性袭击者在行动之前录制好的录像带或者遗书，以增强自杀性爆炸行动的政治和宗教合法性，将自杀性爆炸行动当作英雄主义行动来宣传。正是媒体的大力宣扬，才使相当一部分巴人渴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被媒体以同样的方式宣传；在技巧方面，巴媒体将自杀性爆炸行为描绘成为巴民族解放的爱国主义行为，并赋予其高贵、神圣的光环。有些巴媒体还主动采访自杀性袭击者的父母和家庭，全方位报道自杀性袭击者的相关信息等。此外，媒体的介入还表现在当一个自杀性爆炸行动取得成功时，自杀性袭击者的事迹随即成为清真寺谈话的主要内容，自杀性袭击者的照片贴满大街小巷，有关自杀性爆炸的标语也处处可见。总之，媒体的广泛介入，不仅扩大了“烈士”情结的影响面，而且对普通民众具有强烈的感召力。

可见，巴勒斯坦的教育界和媒体对“烈士”的关注已对巴勒斯坦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产生了深远影响，“烈士”赋予巴年轻人以成就感，使其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6]87} “烈士”情结或者“烈士文化”不会因为自杀性袭击者的死亡而消失，会因教育和媒体的关注而具有持久性。

(三) 巴普通民众对“烈士”行动的支持使“烈士”情结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巴民众是巴历史进步的推动者，任何一种斗争方式，如果缺乏民众的参与和认可都将显得苍白无力。1993～2002 年共有 135 位自杀性袭击者对以色列平民或士兵实施袭击。^[9] 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自杀性爆炸行动在巴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自杀性爆炸事件，不是巴社会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和反应，这种模式得到民众的鼓励与支持。^[11] 巴民众对自杀性爆炸行动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对自杀性爆炸行动的态度。很多巴民众对自杀性爆炸行动持支持和认可态度，所以当自杀性爆炸行动获得成功时，他们会为此感到欣喜，积极参加公众集会或游行，在大街上张贴自杀性袭击者的照片，以婚礼仪式的规格宣读自杀性袭击者的事迹，甚至将小孩打扮成

腰上缠着炸药的自杀性袭击者等。^{[5]829} 2001年7月的民意测验显示,支持暴力行动的人占52%。到2001年12月,支持暴力的人则超过82.6%。^{[1]63} 巴民众对自杀性爆炸行动的支持态度在巴营造了一种崇尚自杀性爆炸行动的氛围。自杀性袭击者的父母以有这样的子女而感到骄傲,自杀性袭击者的亲戚以他们的英雄举动而感到荣耀,自杀性袭击者的同学或朋友以自己有这样的同学或朋友而感到高兴;2.积极参与自杀性爆炸行动。一般情况下,成为自杀性袭击者的人大都为志愿者,他们自愿为巴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由于此类志愿者数量较多,有些组织在招收志愿者时要进行严格的筛选。哈马斯的一位负责人说,我们只能从这些志愿者中选出一个合适的人选,其他人会感到失望,但他们必须学会耐心等待,等待真主的召唤。^{[3]114} 对那些没有被选上的人,他们则积极地学习《古兰经》,全方位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希望能够早日得到真主的召唤。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巴人表现出想成为自杀性袭击者的意愿。^[10]一位父亲告诉某电视台的记者:如果我有20个孩子,我会把他们都送到以色列去,让他们引爆自己。此外,巴民众积极参与自杀性爆炸行动还包括间接参与,如帮助自杀性袭击者的父母和家庭,积极传播和宣扬“烈士”思想与言论,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执行自杀性爆炸行动所需的交通工具、服装、武器等。

不管自杀性爆炸行动发生后是哪个组织出来宣称对其行为负责,这都不影响自杀性爆炸行动的群众性,因为执行和参与自杀性爆炸行动的大都是巴普通民众。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参与自杀性爆炸行动,都说明“烈士”情结在巴勒斯坦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只是这种群众性在不同的人身上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而已,群众性是自杀性爆炸行动得以不断实现的推动剂。

(四)“烈士”家庭和父母的反应增强了“烈士”情结的渲染性。自杀性袭击者的家庭特别是父母对自杀性爆炸行动的反应在自杀性爆炸行动的宣传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父母对孩子的感情是真挚的,他们的态度和观点对自杀性袭击者来说是真实可信的,这胜过任何夸张的舆论宣传和铺天盖地的广告。自杀性袭击者的父母在得知自己的子女成为自杀性袭击者时都会感到非常高兴,当马萨瓦比成为自杀性袭击者后,有记者采访其父亲,父亲说:我为儿子以这种方式死而感到高兴,因为他既没有死在家里,也没有在检查站被射杀。^{[3]89} 另一位袭击者的父亲在公开场合宣称:我为自己的儿子炸死21个以色列人而感到骄傲,对他的死,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他是巴勒斯坦儿子的名义牺牲的。^{[3]111} 所以当某个家庭出现了一位自杀性袭击者时,其父母会拿出柠檬、茶、糖果等食品让前来祝贺的人们分享。与此同时,某些宣称对自杀性爆炸行动负责的组织还会向自杀性袭击者的父母提供经济资助,改善其居住环境,提升自杀性袭击者家庭的社会地位。自杀性袭击者家庭社会地位的明显改善深深影响了周围的民众,那些家庭观念强、孝心重的孩子于是争相仿效自杀性袭击者的行为。

自杀性袭击者的父母是其最亲近的人,因此自杀性袭击者父母对于自杀性爆炸行动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本人意愿的延伸,父母对自杀性袭击者的行动表现得越高兴、自豪,自杀性袭击者的行动就越显得有价值:首先,自杀性袭击者父母的态度告诉敌人,巴勒斯坦人不会因为死亡而变得悲伤不已,他们喜欢并热爱死亡,他们死亡的愿望与以色列人生存的愿望一样强烈^{[3]87};其次,自杀性袭击者父母的态度也向普通巴民众传播了这样一个信息,即成为自杀性袭击者家庭和自杀性袭击者的父母是幸福的、这进一步鼓舞了巴普通民众的士气;最后,自杀性袭击者父母的支持态度就是对自杀性爆炸行动的认可,它表明自杀性爆炸行动是有价值的。他们这些人不仅为巴伟大事业做出了贡献,而且也为家庭尤其是父母带来了荣誉。

(五)激进组织对“烈士”行动的周密策划使“烈士”情结极具组织性。自杀性爆炸行动不是简单的狂热之举,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周密行动。自杀性爆炸行动大都目的明确,如破坏巴以和平进程、报复以色列的霸道行径或与其他极端组织竞争等。^{[11]575} 因为自杀性爆炸活动是长长的

组织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12]，所以，一般而言，自杀性爆炸行动背后总是有某个组织支撑。在巴勒斯坦，有四个组织宣称对自杀性爆炸负责，它们分别是哈马斯、伊斯兰圣战、阿克萨烈士旅和巴勒斯坦解放阵线。^{[13]62}为了发动自杀性爆炸行动，这些组织先招募志愿者，然后对这些志愿者在宗教思想、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和技术操作三个层面进行训练，并做相应的准备工作，如收集情报、获取炸药、制作自杀性爆炸所需的爆炸装置。为增加杀伤力，各激进组织的爆炸专家还会给炸药中加入钉子和玻璃渣，选定目标并谋划如何接近选定的目标。^{[6]85}最后是自杀性袭击者的告别仪式，包括录制录像带，说明此次行动的目的和背景以及撰写遗书、准备《古兰经》和执行自杀性爆炸行动所穿戴的服装、假发等。自杀性爆炸行动完成后，自杀性爆炸行动所代表的组织会公开宣称对此次行动负责。除了公开自杀性袭击者的录像带外，它们还把自杀性袭击者的相关资料送给媒体，以此来扩大自杀性爆炸行动的影响，甚至会支付自杀性袭击者纪念活动和埋葬的费用且给予自杀性袭击者家庭上千美元的抚恤金。^{[6]72}有的组织还会派人专门照顾自杀性袭击者家属。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招募自杀性爆炸行动的志愿者开始到处理自杀性爆炸行动成功后的善后事务等一系列活动都是在激进组织的精密策划下进行的。虽然仍有少数自杀性爆炸行动是个人行为，但大多数情况下，自杀性爆炸行动都代表一定的组织。这些组织所提供的资金、训练、教育以及各种服务等在很大程度上为自杀性爆炸行动的顺利执行提供了保障，所以自杀性爆炸行动本身都具有很强的组织性。自杀性爆炸行动的组织性决定了“烈士”情结的组织性，即“烈士”情结并不是混乱无序的，而是巴人思想感情的有组织的梳理。巴勒斯坦各极端组织为了本组织的利益，将巴人的“烈士”情结进行有利于本组织利益的引导和利用，并适时将这种“烈士”情结转化为成功的自杀性爆炸行动。

三、对“烈士”情结的思考

巴人的“烈士”情结孕育在绝望、无助和羞辱中，以致有学者认为：深深的伤害、侮辱和无助使得巴人走上了暴力反抗的道路。^{[11]574}巴人的“烈士”行为既是对“烈士”情结的实践，也是对“烈士”情结的提升。这种“烈士”情结看上去有悖于整个历史发展的潮流，但却是巴人对特殊现实的非理性反应。也许面对复杂的巴以局势和强大的对手，巴人所能依赖的似乎也只有自杀性爆炸行动了。既然不能很好地活着，为什么不能“光荣”地死去？对他们来说，生命只有在结束时才会有意义。正如有些巴勒斯坦人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生命一文不值，我们的生命只有成为武器才会有价值。^{[3]2}所以巴勒斯坦人的“烈士”情结折射出巴人对死亡的狂热追求。他们认为，只有有人义无反顾地死去，才会使剩下的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通过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巴勒斯坦人的悲惨遭遇并不能说明其“烈士”情结是合理的，这只是一种非理性的狂热情绪，其存在不仅无助于巴以冲突的顺利解决，而且还会破坏中东和平进程，进而增加解决巴以问题的难度，“烈士”情结在巴勒斯坦的蔓延对巴以双方来说都是非常有害的。无数的事实证明，巴以问题的有效解决不能依靠这种极端方式。

当前巴勒斯坦政坛巨变会在短时期内减少自杀性爆炸行动的发生，因为法塔赫与哈马斯目前的斗争重点是如何在交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对以斗争退居其次，因此针对以色列的自杀性爆炸行动已有所减少。与此同时，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法塔赫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巴以冲突问题，并对自杀性爆炸行动持反对态度，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自杀性爆炸现象的频发。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巴政坛巨变如果没有完全改变巴方在冲突中的劣势以及巴民众的绝望心理，

彻底消除自杀性爆炸现象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 [1] Shaul Shay. The Shahids Islam and Suicide Attacks[M]. Herzliya: The 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2004.
- [2] Avram S. Bornstein. Crossing the Green Line between the West Bank and Israel[M].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2.
- [3] Christoph Reuter. My life is A Weapon, A Modern History of Suicide Bombing[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 [4] 巴以问题透视：死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EB/OL].[2003-06-04]. <http://www.people.com.cn>.
- [5] Shaul Kimhi and Shemuel Even. Who Are the Palestinian Suicide Bombers?[J].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2004 (4) .
- [6] Assaf Monghadam.Palestinian Suicide Terrorism in the Second Intifada: Motiva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Aspects[J].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2003 (26) .
- [7] Nasra Hassan. An Arsenal of Believers: Talking to the “Human Bombs”[J]. The New Yorker, 2001 (19) .
- [8] Daphne Burdman. Education, Indoctrination, and Incitement: Palestinian Children on Their Way to Martyrdom[J].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2003 (15) .
- [9] Israeli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ebsite [EB/OL].[2006-08-03]. <http://www.mfa.gov.il>.
- [10] Hundreds of Men, Women and Volunteer for “Martyrdom Operations”[EB/OL]. [2006-08-03]. <http://memri.org/bin/articles.cgi?Page=archives&Area=sd&ID=SP74104>.
- [11] Dipak K. Gupta, Kusam Mundra. Suicide Bombing as a Strategic Weap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Hamas and Islamic Jihad[J].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2005 (17) .
- [12] Ehud Sprinzak. Rational Fanatics[J].Foreign Policy, 2000 (5) .
- [13] Human Rights Watch. Erased in a Moment: Suicide Bombing Attack Against Israeli Civilians [EB/OL].[2006-08-03]. <http://www.ngo-monitor.org/article.php?id=879>.

Exploring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Palestinian Suicidal Attacks

WANG Yaning

Abstract As far as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is concerned, especially whe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suffered setback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Palestine and Israel is off, more and more Palestinians wish to be a “marty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Palestinian “martyr” complex, deals with the embodiment and rethinking of this complex, and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is complex is the embodiment of unbalance of Israel and Palestine in Israeli-Palestine conflicts, and it is still the unreasonable reactions of the Palestinians.

Key Words Palestinian; Suicidal Attacks; “Martyr ” Complex

（责任编辑：孙德刚）